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马克思主义 阶级分析方法的坚持和运用

李强,唐棣宣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市 400715)

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和划分标准的观点,创造性地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科学划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理论的中国化;运用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关系和政治态度上分析阶级的观点,深刻阐述了社会各阶级的阶级属性,揭示了不同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依据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同阶级政策密切联系的观点,系统论述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和各阶级间的关系,制定了符合革命实际的阶级政策。新形势下,系统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历程,对目前制定科学的阶级阶层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2-0080-05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理论的中国化,为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新形势下,全面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发展脉络,对制定科学的阶级政策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一、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和划分标准的观点,创造性地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科学划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理论的中国化

“区别各阶级的基本标志,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具体估量和划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理论的中国化。

1922年,党的二大对社会阶级状况进行了大体划分,指出在外国商品充斥中国市场过程中,工商业资产阶级逐渐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农民分化成为“富足的农民地主”、“独立耕种的小农”和“佃户和农业雇工”^{[2]113},破产失业的手工业者、小店主和小雇主壮大了无产阶级队伍。1926年,在进行大量阶级调查基础上,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从理论上初步阐明了阶级划分及其划分标准问题。他认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自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经济,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3]4-8}。在这里,毛泽东从经济关系上把握阶级划分和划分标准,将阶级分析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阶级划分和划分标准作了进一步探索。1933年毛泽东发表《怎样分

* 收稿日期:2010-12-15

作者简介:李强(1965-),男,四川遂宁人,政治学博士,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科规划重大委托项目“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研究”(2009-ZDWT005),项目负责人:陈跃。

析阶级》一文，并主持制定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全面阐述了农村阶级划分理论，把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理论提高到了一个水平。这表现为：首先，对农村阶级成分进行了细致划分。在农村阶级划分中，毛泽东不但对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进行了具体分析，同时还根据不同阶级的情况进行了细致划分。比如，根据地主的剥削方式和经营状况把地主划分为出租地主、经营地主、破产地主、高利贷者等。其次，提出了农村阶级划分的“质”的标准。毛泽东认为，区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的主要标准就是土地占有关系和剥削关系。他说：“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贫农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整的工具；有些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整的工具。一般都须租入土地来耕，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工人（雇农在内）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3]¹²⁷⁻¹²⁹再次，阐明了农村阶级划分的“量”的标准。毛泽东认为，阶级剥削量和时间也是阶级划分的重要标尺。他指出：“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其剥削收入的分量，以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为限度。”“从暴动时间起向上推，连续过地主生活满了三年者，即构成地主。”“从暴动时间起向上推算在连续三年内除自己参加生产以外，还依靠剥削为其全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其剥削分量超过全家一年总收入百分之十五者，叫做富农。”^[4]这些论述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认真总结各革命根据地根据地进行阶级划分的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取得了重大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实现民族独立成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最高利益。这种形势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国内阶级状况作重新估量和分析。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阶级划分和划分标准问题：一是对阶级成分作了更为规范的划分。毛泽东指出，现阶段的中国社会里，有什么阶级呢？有地主阶级，有资产阶级……又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有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又划分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5]⁶³⁹。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农民阶级包括富农、中农和贫农；二是强调把经济地位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毛泽东强调指出：“所有这些阶级，它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全依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5]⁶³⁸地主阶级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多数可以归为小资产阶级。这些论述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学说在中国具体实际中的科学应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中国化。

解放战争时期，为最大限度地争取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阶级划分和划分标准问题。1948年2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强调，观察和划分社会阶级“应以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占用关系，以人们的生产关系为唯一的标准”^[6]。这一论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标准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和划分标准理论。

二、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关系和政治态度上分析阶级的观点，深刻阐述社会各阶级的阶级属性，揭示了不同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7]每个社会阶级在经济关系方面的不同决定了各阶级的政治思想和对待革命的态度存在差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从经济关系和政治态度上分析阶级的观点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揭示了不同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中国各社会阶级经济关系和政治态度的分析，初步回答了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这表现为：首先，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是富有革命性的领导阶级。1925年1月，党的四大强调：“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因此中国的

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2]333}。其次，农民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力量。1925年1月，党的四大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2]358}再次，官僚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朋友。1925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指出官僚资产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民族资产阶级尽管是“动摇不定”的阶级，但不是革命的对象，而是革命的动力之一。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重点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富农阶层的性质、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分析。然而，受当时复杂社会环境影响，中国共产党对它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过程。这表现为：一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跌宕起伏。党的“八七”会议认为，蒋介石出卖革命证明“民族资产阶级离开国民革命的阵线而走入反革命的营垒”，“他如今和买办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大地主相像，将要成为外国资本对于中国统治之支柱”^[8]。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把民族资产阶级看做是最危险的敌人。这些认识严重背离了中国革命实际，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认识。1935年12月，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因此，“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3]145}在这里，毛泽东把阶级分析方法作为认识问题的锐利武器，指明了民族阶级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的特性。二是对富农阶层由敌变友的认识转变。1928年，党的六大指出，富农阶层的特征总结就是靠剥削雇农的劳动获得和出租土地或放高利贷谋求利润。这些文件虽然对富农阶层的性质作了粗略划分，但未能把富农与地主、农民等其他阶级严格区分开，也没能阐明它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1935年12月，党中央通过的《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强调，在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形势下，“富农也开始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掠及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革命斗争”，“我们应该联合整个农民，造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故意排斥富农（甚至一部分小地主）参加革命斗争是错误的”^{[9]585-586}。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同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相结合，深化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阶级属性、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系统论述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阶级属性、历史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指出，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作为阶级来说，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而不是革命的动力。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外国资本家利益服务的，历来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尽管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但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本质区别。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大资产阶级的压迫，日益走向破产没落的境地，是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富农带有半封建性，是农村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府不应把富农看成与地主无分别的阶层。中农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剥削，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贫农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无产阶级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这些论断是毛泽东对以往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

解放战争时期，根据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变化，1948年2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规定》对地主、新旧富农、中农、贫农、雇农、手工业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小商贩、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工人等的阶级属性、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分析。这些论述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实际，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保证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三、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同阶级政策是密切联系的观点,系统论述社会各阶级状况和各阶级间的关系,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阶级政策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各阶级进行深入、系统和全面的分析是制定正确的阶级政策的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观察和分析社会各阶级问题,根据不同历史时期革命任务制定出了正确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政策。

1925年,党的四大指出,要取得民族革命的胜利,必须“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作战”^{[2]338}。党的四大还强调,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受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高和缺乏革命实践经验影响,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央领导机构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使党的阶级政策偏离了正确发展的轨道。

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变化的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中国共产党制定出一系列符合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阶级政策,但受“左”倾错误干扰,这些阶级政策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这表现为:首先,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土地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实际斗争需要初步回答了依靠谁和反对谁的问题。1933年,中央局通过的《苏区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指出:为保证查田运动顺利开展,党的正确策略“应该是依靠在雇农及贫农(农村中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与中农群众结成巩固的联盟,并使雇农群众在查田运动中起先锋队的领导作用,来消灭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10]。这些政策符合当时的革命实际,推动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其次,从中立、反对富农到联合富农。土地革命前期,由于对富农的性质认识模糊,导致党的富农政策出现动摇性。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指出,由于中国富农具有半地主性质,容易走入反革命的阵营,因此“反富农的斗争,应与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同时进行”。同时又认为,“当富农摇动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时期”,为“减少敌人的力量”,我们党不应该采取斗争的政策对待富农问题,而应采取中立富农的政策。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认为“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已经不适当了”^{[9]585},应根据革命实际改变“左”倾的富农政策。再次,从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到团结民族资产阶级。1928年,党的六大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现在已“走到帝国主义豪绅地主的反革命营垒……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只有反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11]。基于这种错误判断,直到瓦窑堡会议,我们党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始终采取打击政策。1935年12月,在全面清算“左”倾关门主义基础上,毛泽东认为尽管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妥协性的特点,但是“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3]145},这决定了他们能够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应采取团结斗争的政策。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各阶级重新审视,提出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阶级阶层政策。这表现为:一是依靠农民阶级,争取地主开明绅士,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1942年1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指出:“农民(雇农包括在内)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故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提高农民抗日的与生产的积极性”。“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12]282},他们不但有抗日要求,而且有民主要求,“故党的政策,不是削弱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但富农有其一部分封建性质的剥削……故在农村中实行减租减息时,对富农的租息也须照减”。“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并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绅士。”^{[12]281}这些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通过联合和斗争的形式,团结和争取资产阶级。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把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又把大资产阶级区别为亲日派和亲英美派,针对不同阶级的政治态度分层制定政策。1940年3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强调:“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

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5]745}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原则同民族解放运动的实际相结合,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和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巩固和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比较成熟的阶级政策。这表现为:一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提出放手发动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普遍地变更土地关系,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强调:“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13]1317}这条总路线正确解决了土地改革中的依靠力量、团结对象、打击对象和土改目的,标志着我们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完全成熟,为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民族资产阶级右翼。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认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是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而对于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由于他们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倾向,“我们应当向着接受他们影响的群众进行揭露的工作”^{[13]1254}。这些政策壮大了革命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理论的中国化。新形势下,系统梳理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发展脉络,对现阶段制定科学的阶级阶层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列宁全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0.
-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3]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549-556.
-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 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179.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9.
- [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257
- [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208.
- [1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00
- [1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3]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刘荣军